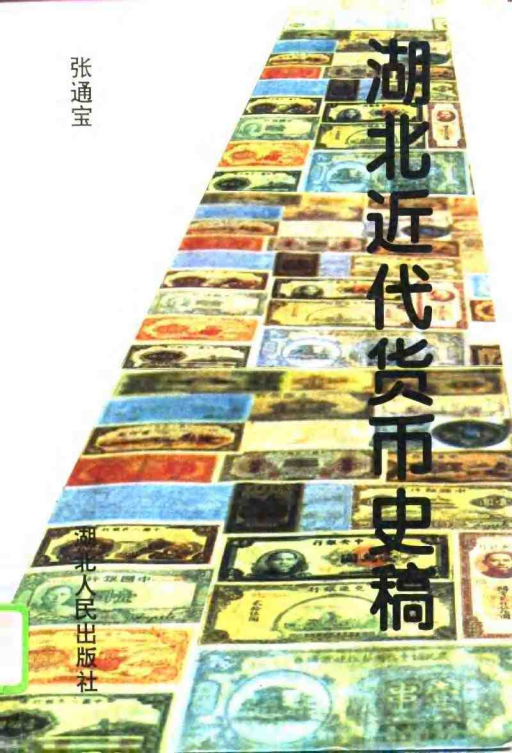


湖北近代货币史稿

张通宝

湖北人民出版社



95
F822.9
17
Z

湖北近代货币史稿

张通宝

X222.1-3



3 0116 5077 1



C 湖北人民出版社

219571

鄂新登字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近代货币史稿/张通宝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ISBN 7-216-01445-6

I. 湖...

II. 张...

III. 货币-历史-湖北-近代

IV. F822.763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22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电话(027)5829482〕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75印张21插页 178千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670

④〔简精装〕 定价:20.00元

〔精装〕 定价:35.00元

绪 论

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初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这段历史,史学界称之为“中国近百年史”。这百余年间,中国社会风云急剧变幻,政治时局跌宕起伏,与此相伴,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 1949 年全国解放为止。在此期间,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的,既有封建性的银两、制钱和银钱票等旧的币制,又有资本主义性(也是殖民地性)的银元、铜元和银行兑换券,而银行兑换券既有银元票、铜元票,又有银两票、制钱票,不仅有本国银行发行的,又有外国银行发行的。即便银元和铜元,因时不同、因地各异,也是形形色色、林林总总,而且纸钞、铸币,皆是中外混用。如此五花八门、杂然并存的货币现象,实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特有,世界各国,殊为鲜见!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各类政权的递嬗,这些新的与旧的,封建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本国的与外国的,多种货币的激烈争斗,此长彼消,构成中国近代百余年来极其紊乱的多元化货币及其混合流通。然而,

“乱久而治，自然之势也。”以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大革命洪流中诞生的农民协会货币为端始的人民货币，遵循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指导，不依附于国内外任何货币而卓立于世，并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由弱小趋于强大，直至伴随人民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最终结束近代货币混乱的历史，使之百川归海，统一于独立自主和基本稳定的人民币。

整个中国近代货币的发展过程，交织着早期中国资产阶级同封建统治势力的斗争，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以及广大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因而，中国近代货币历史，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真实写照，又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记录。

湖北，处水陆通衢，当四战之地，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在近代中国，历史地位尤为突出。探究湖北近代货币的历史，不仅能够从一个侧面更深入地了解湖北近百年史，而且还由此窥见中国近代货币史之全豹。

湖北近代货币，具备中国近代货币的全部特征；它的历史，足以反映中国近代货币由乱而治的全部过程。然而，湖北近代货币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却不仅止此，还在于——也是必须着重阐述的——湖北近代货币有着自身突出的特点。

这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清末币制改革中不止一度地引路先行，是湖北

近代货币的一大特点。

清末币制，原本银两、制钱相辅而行，但在实际行用中，又杂以纸币（民营钱庄之银票、钱帖）和银元（国外流入）混合流通。鸦片战争后，五口开放通商，对外贸易既有发展，国内市场也随着扩张，加之战后经济凋敝，财政困窘，币制问题遂愈趋复杂。紧接着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军费，又增发难以兑现的官票宝钞和劣质铜、铁、铅大钱而导致通货膨胀，币制问题，终至江河日下，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当时景况：有银两又有外国银元，有制钱又有铜、铁、铅大钱，有官票宝钞又有钱庄私票；价格上银两不同于银元，制钱不同于大钱，官票不同于私票；何况银两、银元、制钱、大钱、官票、私票本身又各自有着种类的不同和价格的差异。其乱如是，以致朝野上下，谤议沸腾，怨嗟盈路。欲摆脱困境，惟改革币制。即，改银两为银元，以除成色平砧纷歧之弊；改制钱为铜元，以求计算简便、价值划一而又不易盗铸伪造之利；发行可兑现纸钞，以开信用货币风气之先。然而，执意维护封建法统的清廷却冥顽不化，徒劳无功地在恢复旧币制上枉费心机、徘徊留连。

尽管如此，客观现实的演进，却已表露得十分显明：外国银元无限制地流入，在沿江沿海乃至内地各省份，渐取银两地位而代之；香港铜币，即“港仙”在广东等沿海地区行用已久，且备受欢迎；民营钱庄自由开发银票钱票，日益盛行；更有甚者，外国银行在华擅发钞票，毫无顾

忌,不但损害了中国主权,亦且侵蚀中国国民经济。有鉴于此,少数头脑较为清醒的封疆大吏出于“维主权,存正朔,收利权,塞漏卮”,维护清王朝统治利益的动机,率先于治下对币制试行革新。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即为其中典型人物。早在两广总督任上,张之洞就曾奏准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始试铸银元,督鄂后遂援照广东成案,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奏准在省城武昌设立银元局,次年即行开铸。湖北银元,不惟铸数甚多(每日可铸1.4万余两,约2万元),且“以成色较优,故畅行江浙各地”。其后,江苏、山东、四川等十余省亦相继设局自铸。面对既成事实,清廷于莫之奈何之余,为划一银元形式质量,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和二十七年先后两度普令各省停铸银元,归并湖北、广东两省代为铸造供给。然而均告不果。至于国家铸币总厂,则迟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方设立于天津,开铸银元更是晚到三十三年七月的事了。

清季湖北货币中影响最大者当属湖北官钱局所发官票。在政府发行的可兑现纸钞中,它是较早的一种。湖北官钱局筹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初业务尚属平平,光绪二十七年后,即进入兴盛时期。斯时,发行有制钱票、银两票、银元票三类八种面额的纸钞,在省内外设立分局、代理店近20处,一任持票商民自由兑现。湖北官票价值稳定、信用弥坚,每串钱票价最高值银达九钱以上。是以商民入等,无分本埠外埠,咸乐用之。终清末之世,湖

北官票发行之多、信用之佳、流通之广，为他省所不及。而湖北官钱局在此期间亦赢利甚巨，所获盈余约逾 500 万两白银之多。至于辛亥之后湖北官票信用塌台，恶声四起，则纯系北洋祸鄂滥发无度所致。湖北官票在清季诸币中之所以影响重大，不仅在于它作为管理有力的可兑现纸钞，在“平抑市价，纾解民困”上发挥了有效作用，也不仅在于它信用颇著、行兑方便、流通范围广至长江中、下游诸省，还因为湖北官票的问世，适值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加速加剧、中国资本主义亦在封建废墟上开始萌发之际，恰好符合顺应了新的经济形势对现代纸币的迫切需求，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信用货币制度的发展。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湖北又继广东等省之后开铸铜元，发官钱局试销。时因民间日用正苦于“钱荒”（制钱制度业已崩溃），机制铜元又远较昔日制钱形制精美、行用方便，是以流通甚畅。此一发便不可收。竟至日夜赶铸，由最初日出铜元 4 万枚增到最多日出 400 万枚。数年下来，湖北铜元铸数之多，余利之厚，皆居全国各省之冠。铜元形制上虽仿自外国铜币，实质上乃咸丰大钱的继承和演变，并未脱离制钱体制。但作为从封建性货币向资本主义货币过渡的币制，相较行将就木的制钱而言，铜元仍不失为有所进步，因而逐渐成为辅币，与银元并行。

清末币制改革，山重水复，障碍横生，显示出封建守旧势力的顽固和鼎新革故的艰辛。主持湖北币制改革的张之洞亦曾喟叹“无日不在荆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

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云云。清末币制改革,多为因形势所迫,外臣在本治已行革新之举(当然先获奏准),内廷再接受既成事实,并加以整饬。如《整顿圉法酌定章程》(1905年)颁布于湖北银元问世11年之后;《大清银行则例》(1908年)制订时,湖北官票已发行12年;至于《国币则例》、《兑换纸币则例》等等则晚到1910年清亡前夕了。在这次“自下而上”的币制改革中,湖北货币屡屡先行,功不可没。

二、在人民币成长过程中保留有唯一的完整历史轨迹,是湖北近代货币的另一大特点。

人民币,系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过程中,由北伐战争时期的农民协会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各人民政权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而建立的人民武装力量、团体与政权所发行的各种类型的货币,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

人民币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密不可分,紧紧相连。因此,人民币的历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近代货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相适应,并为其所规定,人民币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由分散到统一,又由局部统一到全国统一的过程。因此,无论在人民币史的

研究中,抑或在地方近代货币史的研究中,对地方人民币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正是在这一点上,湖北人民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湖北人民币,发轫于湖北省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发行的流通券。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占武汉,北洋军阀统治湖北的历史遂告结束。随着武汉作为全国革命中心地位的确立,湖北农民运动形成高潮,得革命风气之先的黄冈县尤甚。至次年春,农民协会组织已遍及黄冈全县,会员逾20万人。为解除农民经济困乏、调剂乡村金融,黄冈县农民协会于1927年5月,“将各区没收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之财产,尽数集中,举办全县农民信用合作社”,发行“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在黄冈全县范围流通,予广大农民借贷之便。见有一串文的一种。

黄冈县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流通券,与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发行的布币、湖南浏阳浏东平民银行发行的临时兑换券和信用券同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人民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以湖北为主体的鄂豫皖、湘鄂西、鄂东南三个根据地的形成,湖北人民币获长足发展。三个根据地皆设立有银行,并发行了货币。这些货币行用于鄂东南、鄂东北、鄂西北、鄂西南和江汉平原的数十个县,几近覆盖大半湖北,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这批湖北人民币所用币材多样,有纸、银、铜、布等,形制亦优劣不等、精粗各异,生动反映了当年革命斗争形势与环境的变幻转化。鄂豫皖、湘鄂西、鄂东南根据地设立的各级银行(含鄂豫皖苏维埃经济公社),据目前统计在湖北境内者共十五家(行名更换者在外),发行各类券别的货币 30 种。这种高度的分散性,为研究湖北近代货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以湖北为重心的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很短时间就形成局部统一的独立战略区。湖北人民币亦随之划一为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发行的抗币,通称“边币”。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高度分散性,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局部统一,标志着人民币的发展跃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抗日战争时期“边币”的发行、流通、回笼,以及其他一系列货币政策与货币斗争策略,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奠定的基础上趋于成熟。鄂豫边区孤悬敌后,长期处于敌伪、顽夹击的恶劣环境,造成“边币”的生存、发展形势较之其他抗币更为严峻。然唯其若此,才使豫鄂边区建设银行货币的成长、壮大历程伴随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而多姿多彩、有声有色。其中,为严禁敌钞、伪钞在边区流通、直至彻底驱除,而采取的多种举措,尤其是将边币兑换机构抵近到武汉市郊之姑嫂树、王家店等地富有传奇色彩的斗争;对法币“在基本区维护,在游击区抵制内流、鼓励外流”,后又依据形势发展逐步限制、排挤的策略;“发展边币,奖励储藏,吸收游资,充实边区

建设银行,逐步统制外汇”,改储备金、银为储备粮食等物资为边币发行保证,以及“健全金融机构”、“建立边币本位”等政策和措施,都为湖北近代货币,乃至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历史增添了丰富而又精彩的内容。

人民解放战争中期,湖北长江以北的大部地区成为中原解放区的组成部分。1948年6月,中原解放区开设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中州农民银行币,并建立起地跨湖北、河南、皖西、陕南和豫皖苏边广大区域的较为完整的货币系统。中州币的发行,标志着湖北近代货币史上历史性的转折:湖北人民币最终结束湖北地方性货币的历史,并由此开始了彻底肃清包括法币、各种铸币和外币等一切非本位币,使近百年来湖北紊乱不堪的币制归于统一的伟大实践。由于湖北解放区地处中原解放区前沿,隔江而峙的武汉又是国民党政权华中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这一时期货币斗争的激烈程度当可想而知。为确保斗争胜利,在中州币发行之初,曾一度采取“稳健慎重发行和联合现洋兑现”的方针,推行本币,打击法币。当中州币在市场巩固了立足点后,才逐渐摆脱与银元的联系,并进而展开对银元的斗争。早就因当局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而深受其害的湖北国统区金融市场,在解放战争后期更是“日之将夕也,悲风骤至”,随着国民党政权巨大破坏性金融措施的接连出笼而迅速崩溃。国统区金融市场的总崩溃,其恶果不可避免地波及影响到湖北解放区,加上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湖北各解放

区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通货膨胀、物价急剧上涨的现象。尽管与国统区相较,程度轻微、性质迥异,但解放区的广大群众毕竟为人民货币在湖北的最后胜利付出了代价。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有着正确的货币政策和斗争策略,以及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在人民货币的最后一战中,损失被减轻到了最低限度。

1949年5月以后,随着武汉和湖北全境的解放,中州市完成历史使命,陆续退出流通,湖北金融市场遂顺利纳入新中国统一的货币体系。

由上可知,湖北人民货币经历了由萌芽状态到奠定基础,不断发展壮大,最后走向全国统一这样一个人民货币史的全过程。更为可贵的是,在人民货币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具有湖北货币的丰富实物佐证。如此全面、系统、完整的人民货币史料,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足可引以为荣。

上述湖北近代货币的两大特点,可以赋予人们许多启迪,但综观湖北近代货币的全部历史,提供人们思考的内容还要多得多。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审视湖北近代货币发展和转化过程中的上下左右及前后内外诸关系,探究湖北近代货币运动变化的原因、影响和规律,这对研究近代湖北的商品生产与流通、财政、金融、物价,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状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可充实、深化对中国近代货币史的研究。

例如：湖北货币在清末币制改革中之所以有着突出的表现，就是因为诸多因素的促成。包括：湖北地处南北通衢、东西要冲，汉口又系粮、棉、油、盐、药、茶、杂货等“大八行”集散地，向来商贾云集；汉口开埠后，成为内地与外国通商的最大口岸；武汉三镇一跃而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地区，湖北近代工业基础随之迅速奠定；甲午之战前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剧，激发湖北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外国金融势力的入侵，也促进了封建币制改革的迫切性，等等。其中，张之洞为改良湖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而作的种种努力，自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反而观之，币制改革的成效，又推动了湖北近代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清末币制改革是基于维护、挽救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因而不可能，也决不会彻底，于是币制依旧紊乱，而湖北这种币制紊乱的状况，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当时湖北社会新旧驳杂的格局，并与之相适应。对此加以深入研究，就不难理解货币运动的一条重要规律：一定历史时期某种货币现象的产生，皆由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反过来又对前者施以相应（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又例如：革命根据地的通货膨胀现象。在各个历史时期，湖北人民货币都或轻或重、或先或后地有过贬值的遭遇。这是因为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财政发行，即货币发行用于财政透支所致。就当时情况一般而论，财政透支超过货币发行总量的三分之一，物价就不易控制，通胀即告发

生。而货币发行用于财政透支的比例，多由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所决定。湖北各历史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或长期处于反动势力包围之中，或处于对敌前沿阵地，要完全依靠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来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决无可能。特别是在革命战争紧迫时期，往往不能不以发行的绝大比重直接用于支持战争。一旦军事上严重失利，根据地面临丧失，则更不待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东南根据地和湘鄂西根据地的情况都十分典型（鄂东南根据地将金银悉数上交湘鄂赣省苏，手头完全不掌握发行保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人民币的膨胀所反映的负担加重，是人民为谋求自身解放所不能不付出的代价，但人民政权始终将稳定通货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紧抓不懈。除了在战争间歇或相对稳定时期，尽量减少财政透支，而将发行更多地用于生产方面以外，有时还采取某些非常措施，如湘鄂西苏区从各机关公款、税收和党团负责人私人积蓄中收回缴销苏币 80 余万元和鄂豫边区为平抑物价抛售部分储备物资之举等等，以尽力维护人民币的信用，充分体现了人民币为人民的本质属性。通过对湖北人民币发生的膨胀现象的分析、探讨，告诉了人们，为了人民长远利益，导致财政透支超量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其性质与旧政权统治下的通货膨胀是截然不同的，但尽管如此，仍需采取有效措施，将人民的负担减轻到最低限度。如此，就能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

附带要提及的是，从湖北人民币的历史看，其膨胀

的性质既不同于旧政权货币,其程度亦远远轻微得多。仅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1949 年上半年,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湖北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都发生了通货膨胀。江汉解放区物价上涨 3~10 倍不等,其中米价每市斤由 1 月的 5 元中州市上涨到 5 月的 39 元中州市,涨率接近 8 倍。而国统区的汉口 1949 年 5 月份米价涨至每石 52000000 元金圆券,为 1 月份每石 1300 元的整整 40000 倍。再如银元,同年 5 月,江汉区银元 1 元黑市价达 2000 元中州市,高于牌价 10 倍;同期汉口银元 1 元市场价为 5430000 元金圆券,而 1 月仅为 167 元。5430000 元金圆券若按当局规定的 300 万比率折算成法币,则出现了一个长达 14 位的天文数字:16290000000000 元(读作十六万二千九百亿元)。以上皆有案可稽,决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谈。

温故知新,鉴往资来。著史修志,莫不融存史、教化、资治于一体。追溯湖北近代货币历史,旨亦在此。虽力有所不逮,而心向往之。

目 录

绪 论

上编 旧政权统治下的湖北货币

第一章 清朝末期 (1840—1911)

第一节 制钱的没落 3

一、制钱概说 3

二、宝武局铸钱的萎缩与停顿 4

三、机器铸钱的试行 8

四、制钱衰亡的原因 9

第二节 银元的推广 11

一、湖北银元局的筹建 11

二、湖北银元的铸造与推行 12

三、“大清一两”银元推行的失败 16

第三节 官票的滥觞 21

一、湖北官钱局的创建 21

二、湖北官票的发行与流通范围 23

第四节 铜元的勃兴 26

一、湖北铜币局的建立 26

二、湖北铜元的铸造数量 28

三、铜元过量铸造的后果与治理 31